



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守候文学之门

当代文学批判

杨光祖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守候文学之门

当代文学批判

杨光祖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守候文学之门：当代文学批判/杨光祖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

ISBN 978-7-5004-6165-4

I. 守… II. 杨…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5669 号

策划编辑 郭沂纹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刘俊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625

插 页 2

字 数 19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文学宏观批判	(1)
一 批评的伦理底线与批评家理论主体的建构	(1)
二 论西部文学及其走出西部的可能性	(14)
三 西部长篇小说创作中的缺失 ——1990年以来西部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种解读	(23)
四 新世纪西北中短篇小说:艺术成就与审美 风格论	(34)
五 质疑与升华: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厘定与新突破 ——以尕藏才旦长篇小说《首席金座活佛》为例	(61)
第二章 文学个案批判	(69)
一 张贤亮:罪感的缺失与苦难的倾诉	(69)
二 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创作误区与文化心态	(83)
三 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四个阶段及其文化心态	(95)
四 贾平凹:如此让人失望	(105)
五 董立勃:才情独异的自我寄生性写作 ——对董立勃长篇小说的一种解读	(112)
六 王充闾散文的一种解读	(124)
七 杨朔散文的文化思考	(130)

2 / 守候文学之门

八	韩石山:贬鲁崇胡为哪般	(137)
九	《品三国》:历史祛魅后的娱乐化与价值错位	(147)
十	《直谏李建军》驳议	(160)
第三章	文学短评	(171)
一	石钟山:逃避难度的流产式写作	(171)
二	韩石山的文学书简	(175)
三	《少年的黄昏》:成人礼的复义写作	(182)
四	《天干地支》:激情燃烧后的文体探索	(186)
五	肉体政治学的独特文本 ——马步升小说《被夜打湿的男人》解读	(188)
六	宗满德:乡土散文的探索与误区	(193)
七	《轻柔之手》:呼唤诗意地栖居	(204)
八	在飞扬的雪花中化蝶而舞 ——读习习散文集《浮现》	(207)
九	批评家惹谁了	(211)
第四章	文学内外	(218)
一	文化家园	(218)
二	艺术闲谈	(227)
	后记	(235)

第一章

文学宏观批判

一 批评的伦理底线与批评家 理论主体的建构

文学批评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一个时代里，优秀的批评家往往只是有数的那么几个，较之优秀的作家，数量很不成比例。但他们（包括那些早已被淹没于文学风尘中的批评家）却对文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就很有有一些艺术素养高、颇有学术造诣，并敢于直言的批评家，比如李健吾、茅盾、胡风、李长之，等等。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市场化、商品化的急剧推进，文学的大幅度边缘化，很大一部分批评家耐不住寂寞，经不住诱惑，也开始急剧地蜕化，红包评论、炒作评论、人情评论纷纷登场。本节主要针对文学批评界的这种道德下滑现象谈两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文学批评的底线伦理与批评家的理论主体建构。

（一）文学批评与批评的伦理底线

当代文学批评经常针对的是当代的作家及其作品，所以对批评家来说，就有了许多外在的压力或诱惑。批评家在评价一部作品时，往往会涉及作家个人的俗世影响、地位、脸面、感情，对作品的批评经常被作家认为是对他们人格的否定，甚至还会招来官司。一些优秀的作家也承认批评的任务就是剔除伪作，并对优秀的作品进行深度阐释，但当批评落到自己身上，还是难以承受，甚至连对自己作品进行独到分析都无法接受。他们无法理解批评家对自己作品的批评也仅是众多批评中的一种，并没有特殊的权威性这一文学批评的基本常识。

那么，作为一名严肃的文学批评家，我们该如何作为？首先，我们一定要守住一个先定原则：不能进行人身攻击。当然，这只是前提，任何公民都无权对另一位公民进行人身攻击。作为作家也必须清楚，批评家对你作品的批评永远不是人身攻击。你的作品一旦面世，任何读者都有评说的权利和资格。其次，文学批评家必须坚守批评的底线伦理：必须对你所阅读的作品作真实的言说。文学批评家的天职就是说真话。求真务实应该是批评家言说的基本职业道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职业底线。即便面对一些影响很大的作家，批评家也不能跟着他们的意愿走。他们的言论、观点仅是你进行批评的参考，不能取代你的思考和观点。

但在目前的中国文坛、学界，学者、评论家往往囿于各种因素：主观因素或外部压力，经常不敢或不愿说真话。其中尤以新出版的文学作品研讨会为代表，由于与会人员大都拿了人家的钱或者是朋友关系，于是在会上就什么好话都敢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真正的批评家倒好像是在无事生非了。这种黑白颠倒的事

例最近几年就颇有一些。比如，韩石山先生曾经批评北大教授谢冕一年同时主编篇目有同有异的两部 20 世纪文学经典，质问让我们读者怎么信任谢冕及他所编的书。这里的是非本来很清楚，但谢冕的弟子为老师讳，讽刺韩石山是“黄土高坡上的人”，“边缘地区的作者”。这还罢了，尤其让我们难以接受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周忠厚教授在他主编的教材《文艺批评学教程》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将此事写入课本，并在第 164—165 页这样评论道：“这种‘棒杀’式的文章，不仅蔑视学理，而且常夹杂着格调低下的人身攻击……谢冕重复选编 20 世纪文学经典，或许有不当之处，但韩石山却对之进行了人身攻击，不仅有失一位批评家的严肃，甚至有失文人风范。”韩石山先生说：“这不是编教材，这是欺世，不光要欺今世，还要欺后世。”“是借教材以行私，这是出了格的丑闻。”^①

我们知道这几年教材编写风行，粗制滥造者居多，像洪子诚先生那样一生写一部《当代文学史》的专家太少了，至于凭借编写教材的权力（当然经费是国家拨给的），把自己的哥们儿写进当代文学史的所谓教授、专家也太多了。文学史成了话语权的争夺和“行私”之地。据说当代文学史已经有上百部之多，它们大多除了浪费国家资源、误人子弟之外，唯一的功能就是给编撰者评职称用了，当然，还有把哥们儿写进“文学史”的功劳。面对这种已经突破批评底线伦理的所谓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当代学术界、批评界竟然很少有人站出来激浊扬清。

这里我们不妨以南京大学丁帆教授主编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为例，再对评论家、学者在文学评论、文学史编写中出现的重大缺失做一点讨论。我

^① 转引自《山西文学》2003 年第 7 期。

个人认为此书虽然个别章节写得颇见功力，但总体来看，是一部非常不严肃的“文学史”，存在着很多硬伤。比如，对“西部”的定义就有很多问题，这个“问题”导致了全书中的许多书写混乱。而且，在他们的“西部”概念下，竟然没有陕西的位置，是不是也应该慎重考虑一下？至于对具体作家作品分析、定位的缺失更是不胜枚举。

这里限于篇幅，只简单谈几处涉及甘肃当代文学的硬伤。我们看第七章第四节“走向圣殿：未完成的报告”。此节就存在着许多让我们无法容忍的偏见。比如，董汉河先生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在国内很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它对历史的反思，引起了文坛内外的高度重视，几乎是第一次书写红军“走麦城”历史的报告文学。它后来能与王家达的《敦煌之恋》一起荣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不是没有原因的。可这样一部在新时期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在《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却只字未提。而对无论在艺术或思想上都有较高水平，连续获得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的《敦煌之恋》，也只用了不足100字。但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他们竟把杨牧的自传体小说《天狼星下》、杨显惠的纪实小说《告别夹边沟》作为报告文学而重点评介。并且，杨显惠写此作时，早已定居天津，能否进入西部文学史，还需要斟酌。

在第七章第一节，关于20世纪90年代诗歌叙述中，提了唐欣之名，而没有专段论述。但对很多诗歌成就远在唐欣之下的诗人却长篇大论。在第七章第二、三节中，书写1992—2003年西部散文、小说时完全忽略了马步升的存在，甚至连名字都不提，我觉得这不仅仅是编写者的审美趣味问题了，而是严重的渎职。在概述段落列举了近30位小说家，近20位散文家，竟然没有马步升，更不要说正文中的论述了。我们不是说马步升文学成就有

多高，但在西部文学中，在1992—2003年这个时段，你不提、不评述马步升，无疑是该书的一大缺失。还有青年作家王新军，也是绝对不能遗忘的，但偏偏他们就遗忘了。众所周知，《当代文艺思潮》是在新时期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评论杂志，是甘肃文坛的骄傲，也是当年研究和评论西部文学的重要园地。但编写者只写了两页多一点，而某副主编对自己一个人的评述就接近两页，而且评价之高也是出人意料。至于在《当代文艺思潮》杂志中做出贡献的评论家屈选、陈德宏、魏珂、李文衡等人都只是提了提名，没有展开评介。在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颇有成绩的支克坚、吴小美、程金城、彭金山等人连名都没有提。上述种种做法，明显违背了一个文学史编写者的“史德”，更不要说“史识”了。

王瑶说：“不能把文学史简单地变成作家作品论的汇编，这不符合文学史的要求。作为历史科学的文学史，就要讲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讲重要文学现象的上下左右的联系，讲文学发展的规律性。”^①如果以此标准来衡量这本文学史著作，它的差距就不知有多大了。那么，它可以作为一部文学史资料吗？鲁迅在一封信里批评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时说：“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②可惜的是，作为一部资料长编，丁帆教授主编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也有一定距离。因为它有意或无意地遗忘了太多的“资料”。

① 钱理群：《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② 《鲁迅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

这样的研究、评论最后就会导致很可怕的后果：圈子批评、哥们儿批评。他们不要任何良知、责任，只要是自己哥们儿的文章、著作，不管写得怎样，水平如何，一律是大肆歌颂。而非哥们儿的文章、著作，那定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大肆否定，全不管你的水平如何。还有红包批评，只要你给钱，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就不仅仅是失去了批评良知的问题，而是一个学者、批评家的人格问题了。

这种非常不正常的学术风气，已经导致了当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创作的浮躁、无聊，也助长了作家的脾气。有的作家不仅听不得一点不同的声音，而且对一些有良知的评论家大肆辱骂。例如最近贾平凹骂李建军，什么“他是我的文学托儿”，（自己）“要赶紧去打一针狂犬疫苗”，“他不是骂出名了吗”，等等。^①《读友》2005年第7期转摘自《文汇报》的贾平凹散文《活人真是难事》一文，其中又有贾平凹不指名的谩骂：“据有人告诉我，他现在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联想到前日余秋雨大骂古远清，什么应该到精神病院去，也是什么你们骂名人以出名，等等，这些所谓大师的表现，真是让我等目瞪口呆。别的不说，单说他们认为李建军等人是骂名人来出名，这种逻辑好像是从刘心武、王蒙与王彬彬论辩时开始的。我们姑且不论他们是否真是想借骂名人来出名，关键是看他们“骂”得有没有道理。

这种不管对方说得有没有道理，先想当然地从写作动机上武断地否定对方，甚至谩骂对方的做法，是不是有点儿不讲道理，有点太离谱儿？许多伟大的作家、批评家都表述过这样的思想：谁若不能指出伟大作家的过错，谁也就不能欣赏其长处；批评应侧重伟大作家的不足；若由于偏见连他们的毛病也欣赏，那么不久我们会

^① 转引自《中国读书商报》2005年6月17日。

步其后尘。那么我们从名家那里得到的启示，或许便是如何将作品写坏了。而那些可怜的、幼稚的作家崇拜病，我们认为是亵渎神圣。若用此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批评界实在太堕落了。

众所周知，欧美的文学批评家一般都与作家不认识，保持自己独立的批评立场。而我们的批评家与作家是哥们儿关系，这影响不影响文学批评的准确性？李欧梵说他一旦认识某位作家，就不会写他的评论了，这有没有道理？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展开讨论。作家虹影经常在欧洲居住，她说：“我的半个基地在欧洲，欧洲的批评家是很活跃的，报纸的书评一针见血，不留情面，他们不需要顾忌作家的面子，他们不必认识作家，更从来不加入到出版社的包装中去，这种独立的评论声音，既来自学院，也来自学院外。而在中国见不到如此活跃的批评，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大遗憾。”她呼吁：“请讨论我们，请批评我们，必要的话，请得罪我们。但是保持沉默，是你们放弃了责任。”^①可惜有这等胸怀的作家在中国太少了。我们看见的是与评论家打官司的韩少功、余秋雨，我们听到的是辱骂评论家的王蒙、贾平凹。

当然，底线伦理仅是文学批评的基点，如果局限于此，则文学批评的深入无从谈起。作为一个合格的批评家，还必须有更多的作为。这就牵涉到批评家理论主体的建构问题，而一个具备理论主体的批评家，一般不会突破底线伦理。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上是有理论有信仰的。现在很有一些人在呼吁宽容，但不要忘了宽容必须是有前提的。对一个尚在批评伦理底线之下的批评家，我们还能谈什么宽容呢？只有在底线伦理之上，我们才能呼唤批评的宽容伦理。

^① 转引自《中国读书商报》2005年6月17日。

（二）批评伦理与批评家的理论主体建构

雷内·韦勒克在《哲学与战后美国文学批评》一文中写道：“批评就是识别、判断，因此就要使用并且涉及标准、原则、概念，从而也蕴涵一种理论和美学，归根结底包含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① 让·斯塔罗宾斯基说：“批评家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同意接受文本强加给他的迷惑的同时，还要求保留凝视的权利。”^② F. R. 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一书中认为批评就是“唤醒一种正确得当的差别意识”。^③

世界文学批评大家已经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优秀的“批评”概念与标准，但是文学本身是富有动态的、经常去挑战可能性的一门学科，它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去量化，什么是好文学，什么不是好文学，标准本不固定，这就给文学批评带来许多困难。一个没有阅读一定数量的优秀作品，没有较高的艺术感悟、艺术鉴赏的批评家，往往还不如界外人士对文学的评价到位。我认为目前文学批评出现众多被读者、作家非议的问题，一个是批评家突破底线，丧失了批评的基本伦理诉求，因为一些文学之外的因素而不敢说真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被很多人遗忘了，就是现在的文学批评界充斥了一大批对文学没有丝毫兴趣，更缺乏文学感悟力、鉴赏力的所谓文学批评家。他们落后的文学观、陈旧的知识、迟钝的文学感觉及其对生活鲜活感受力的缺乏，都是导致文

① [美] 雷内·韦勒克著，张今言译：《批评的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98 页。

② [比利时] 乔治·布莱著，郭宏安译：《批评意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83 页。

③ [英] F. R. 利维斯著，袁伟译：《伟大的传统》，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3 页。

学批评急剧下滑的原因所在。文学本身的复义性、多元性、没有准确结论性，无形中在增加挑战性、冒险性的同时，也降低了文学批评的门槛，出现了一批滥竽充数的所谓批评家。

所以，我们在反思批评家面对文学（文本），丧失真实的言说能力之时，更要反思批评家理论主体的建构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说真话的层面上讨论问题，无疑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只是满足于感悟式、印象式的批评，也还不是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因为它们都还停留在文学文本附庸的批评阶段。出现这些现象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是批评家缺乏文学的理论与信仰；二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一直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我们先分析第二个原因。

中国的批评家大都先天地把自己视为作家（作品）的附属品，作家也经常狂妄地扬言，批评家是靠他们吃饭的。而那种跟着作家转的所谓批评也使得作家、包括读者轻看了批评家，甚至文学批评。略萨说：“文学评论可以成为深入了解作家内心世界和创作方法的极为有用的向导；有时一篇评论文章本身就是一部创作，丝毫不比一部优秀小说或者长诗逊色。”他随后还列举了许多著名例证。^① 雷内·韦勒克说：“‘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原理、范畴、标准等方面，而关于具体文艺作品的研究不是‘文学批评’（主要采用静态的研究方法）就是‘文学史。’“文学研究不能也不应该把文学批评排除在外”，而“批评的目的是理智地认识”。^② 诺思洛普·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一书的“论辩式的

① [秘鲁] 略萨著，赵德明译：《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② [美] 雷内·韦勒克著，张今言译：《批评的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前言”里也论证道：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是文学的寄生虫，批评也是一种艺术，批评家也是成功的艺术家，他说：“批评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结构，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就其所讨论的艺术而言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①因此，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要走上健康的道路；批评家首先应该调整心态，在认真研究文本和作家的基础上，用独立的精神姿态进行作家作品的深度阐释、解析和批评，而不要做吹鼓手或侍从。

至于批评家缺乏文学的理论与信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着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为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②这话说得或许重了一点，但我们现在多的正是这样的批评家。他们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文学理论，甚至连理念都没有，大都是盲目地、匆忙地去搬运西方的文学理论来硬套当代中国的文学文本。现在的评论文章，什么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新批评、新历史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文化人类学、形式主义，等等，让人目不暇接，甚至目眩神迷；使人感到生硬，甚至艰涩难懂。主要原因是，他们对这些理论都没有吃透，又未认真研读文本，就仓促地“活学活用”在自己的批评文章里。

那么，文学批评该以何种方式介入“文学”呢？首先，文学批评肯定建立在文学文本的基础上。其次，我们必须明白，文学批评家应该以“爱护的批判者”的姿态介入文学文本。我们现在

① [加] 诺思洛普·弗莱著，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批评的剖析》，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②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7页。

可以说仍处于思想比较匮乏的时代，我们仍然需要思想（当然是真正的思想）。经验、材料和知识的积累，仅是“学问”的基础；但就文学批评来说，没有文学的真问题就没有真正的文学批评，而打通“问题”与“学问”的正是思想而非其他。黑格尔说：“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由此看来，人的一切文化之所以是人的文化，乃是由于思想在里面活动并曾经活动。”他还认为，缺乏精神和思想贯注的哲学史无异于“死人的王国”。^①我们也可以依此说，没有精神与思想的文学批评也是“死人的王国”。

因此，那种建立在文本阅读基础上的具备批判精神、理论品格的文学批评，才是一个批评家展示自己真正才华之所在。而作为一个中国文学的批评家，我们还需要那种建立在现代汉语写作基础上的，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问题而进行深入研究、思考的原创性的精神与思想。这样“批评家的意见、等级的划分和判断由于他的理论而得到支持、证实和发展，而这些理论也从艺术作品中吸取养分并得到例证的支持，从而变得充实和言之成理”。^②只有百家争鸣式的不同派别的文学理论的出现，文学批评家（界）才能建立自己的理论权威，及其被作家、读者认可的地位。

清代石涛《画语录》说：“受与识，先受而后识也。识然后受，非受也。”^③我们的许多批评家面对一个文本，不是从自

① 黑格尔著，贺麟译：《哲学史讲演录·前言》，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0页。

② [美]雷内·韦勒克著，张今言译：《批评的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③ 吴冠中：《我读石涛画语录》，荣宝斋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己的艺术感受出发，而是从先入为主的外部理论入手，把文学当死尸，进行任意的想当然的解读。这样的文章，貌似颇有理论，其实与所论作品没有任何关系，是一种非常不严肃的学术态度。相对于欧美的文学批评、理论，我们确实感到汗颜。比如，英国著名批评家利维斯针对当时英国文学史上“经典”充斥的现状，认为必须有人站出来做价值判断或重大的甄别，从而形成“一种正确得当的差别意识”。同时，他还认为对一些作家人们交口称赞，可对他们的真正卓越之处却缺乏共同的认识。他的《伟大的传统》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优秀批评著作，在世界文学批评界影响甚大，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即受此书之惠不浅。

由此可见，批评伦理与批评家的理论主体建构还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看文学史，一个有理论信仰的评论家，较之一个没有理论信仰的评论家，在文学评论的操守上肯定要强得多。歌德说：“信仰和无信仰是人类本性中两个极端对立的原则，整个人类历史的主题，依我所见，就是这两个原则的斗争。”“凡是信仰占统治地位、信仰是主导因素、信仰是行动的激发动力的时代，都充满了重大的、震撼人心的、丰富多彩的事件，值得人们永远记住。相反，当无信仰占上风时，那个时代就是平淡无奇、乏善可陈、本质上平庸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类缺乏精神食粮，没有精神上的营养可以汲取。”英国文学史家托马斯·卡莱尔在《卡莱尔文学讲演集》中引用了这段话后评价道：“这是迄今为止最富有创造性的段落之一。”^①

质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胡风与周扬就是典型的例子。夏志

^① [英] 卡莱尔著，姜智芹译：《卡莱尔文学讲演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8 页。